

第四章 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中的作用

在論述了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及其意涵，以及中日民族主義的對立因素與背景之後。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特色與興起的過程既有別於以往，其所產生的影響力也與過去不同，在影響中共對日外交當中，民族主義透過國際及國內層次因素與決策的認知的互動影響，在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層面均產了不同的作用。因此，本章將試圖從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安全的層面，綜觀民族主義因素在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中扮演的作用。

第一節 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日政治關係中的作用

從 1990 年代迄今，中日關係政治逐漸低迷，兩國圍繞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以及東海問題等，磨擦與爭議不斷。學者們稱中日關係「政冷經熱」或「政冷經涼」者有之，稱中日關係「惡化」者也有之。¹尤其是 2005 年初以來，中國各大城市出現了一連串的反日浪潮，更讓中日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關係。本節將從雙方民族主義對立所形成的認知差距，再配合雙方政治關係發展，所遭遇到現實上的瓶頸，從民族主義影響的認知面配合現實關係上的事實佐證，探討中日政治形成困境的因素。

一、冷戰後中日關係政治困境的形成:認知面的評估

關於 1990 年代迄今中日關係政治逐漸趨於冷淡的因素，雙方認知上的差距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蔡增家認為近年來中日兩國的認知差距與衝突，乃是中日戰略目標競逐下所產生的摩差，中日兩國都企圖用過去歷史記憶的事實認知來合理化其對彼此勢力崛起的憂慮。²而探討中日雙方心理層面所形成的認知差距，最為重要的一項因素就是歷史認知的議題，至於導致雙方強化歷史認知差距的強化

¹ 劉江永，「東亞格局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上海)，第 80 期(2005 年 2 月)，頁 66。

²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 年 1 月)，頁 45。

的因素，就脫離不瞭冷戰後雙方民族主義的發展議題。

民族主義是中國人在對外關係上區分敵我劃清界線的途徑，冷戰後中日歷史認知上差距的突出，不只將會影響民族主義建構，更可能會使得雙方關係依據這個心理基礎，而在國家安全與政治關係的發展上視對方為敵人。石之瑜就認為中日之間這種心理，可以追溯到中國國家概念的產生，因為與傳統的天下觀不完全符合，所以才會迫使中國人必須刻意找尋外來的敵人，才能夠進一步地在以地理疆界為基本前提條件的主權國家世界裡，行使對中國人自己心理上有意義的政策行為，這就使得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產生了矛盾的心結。³

此外，從中日雙方國內政治發展的角度來說，中共在失去鄧小平領導之下，高層領導為了爭奪領導權，可能將更加激發民族主義情緒，以打擊反對者，獲得支持。⁴而日本政壇保守化的趨勢，也可能使的外交上民族主義立場更為強烈。民族主義提供了雙方在政治關係上的一個操作點，當彼此不滿對方在國際政治上的作為時，民族主義的對立也就容易突出檯面；另一方面中日民族主義的對立，亦可以成為合理化雙方自身追求政治利益的管道。中共可以透過民族主義來反對美日防禦指針，日本亦可訴諸民族主義來強調中國威脅，透過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形成的對立，使得此種對立的深度已經不只在利益層面，更擴及雙方的心理層面。

而探討民族主義對中日關係的政治困境關聯，若將認知差距與中日關係的政治困境做一個對照比較，有學者利用統計資料分析，從數據上發現了一些關聯性，認為歷史認知識題與中日首腦互訪的政治關係呈現負相關，即證明歷史認知直接的損害了中日的政治關係。⁵而中國之所以對日本的修改教科書以及首相參

³ 石之瑜，*民族主義的外交困境*(台北:世界書局，1995年9月)，頁181。

⁴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2 (Jun 1995), p.291.

⁵ 首先，中日首腦互訪有幾次引人矚目的中斷: 1990年、1993年、1996年、2002~2005年。其中，1990年互訪中斷的原因是: 1989年7月14日，日本參加西方七國對華制裁，即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同時停止高層往來；而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際，江澤民總書記訪日，日本天皇、皇后訪華，所以1993年的中斷亦可以理解為正常中斷。此外，修改教科書事

拜靖國神社反應如此強烈，許多觀察家也都心知肚明，這個問題與歷史無關，與教科書本身也無關，明白的說，這是一個雙邊政治的問題，歷史問題只是一個幌子。⁶亦即在雙邊政治關係出現利益衝突時，歷史問題很容易的就成爲了政治上雙方操作的議題，似乎透過歷史問題，便可以使自己在政治利益上的追求具有正當性。對中共來說，這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會，不僅可以促進國內的民族主義加強團結，而且也可以迫使日本作出政治和經濟上的讓步。⁷

中日雙方在民族主義對立的情境下，雙邊的政治關係隨著認知差距的擴大而趨於冷淡，趨於冷淡的政治關係又會更加加深雙方的認知差距，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在這當中歷史問題成了提供雙方操作的議題，中日兩國用這種選擇性的方式來解讀對方的行爲，在關係良好時，便選擇對方有利的舉動來解析，以掩飾雙方底下相互角力的關係；關係不好時，在歷史記憶強化兩國的認知差距，以及民族主義情緒激化兩國事實認知之下，雙方之間政治議題的衝突層面將更加突顯。

二、冷戰後中日政治關係困境形成:事實面的評估

當前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趨勢，據日本財務省 2005 年 1 月 26 日發表的 2004 年貿易統計快報，中日進出口總額增加 17.9%，達 22.2 萬億日圓，超過了日美貿易總額的 20.48 萬億日圓(增幅 1.1%)。⁸然而對照鮮明地是，在政治關係層面，自 2001 年小泉純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之後，連續四年堅持前往靖國神社參拜，中共

件和參拜靖國神社事件亦呈現週期性有 3 次高潮:第一波發生在 1985~1986 年;第二波發生在 1996 年;第三波發生在 2001~2004 年。從直觀上看，修改教科書事件和參拜靖國神社事件正好和 3 次中日首腦互訪中斷的時間相吻合。而用統計套裝軟體 SAS 做相關分析，檢驗歷史認知事件和首腦互訪之間的相關性，因爲二者都是非正態分佈的資料，故選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通過對相關資料進行必要的處理後，相關分析得到零假設下的概率值 $p = 0.0003$ ，相關係數爲 -0.6896，即有充分理由拒絕相關係數是 0 的假設，歷史認知事件和首腦互訪之間顯著呈現較強的負相關性。可見，歷史認知事件直接損害中日雙邊政治關係，這種影響是可以觀察的、是明顯的。齊志新，「歷史認知與中日政經關係」，《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2005)，頁 42-44。

⁶ 羅志平，「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1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0。

⁷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278。

⁸ "China Now Japan's Top Trade Partner," *The Japan Times Online*, January 27(2005),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article.p15?nn20050127a3.htm>>

自 2002 年起憤而中斷首腦互訪至今。

冷戰後中日雙方在國際及國內的諸多事件影響下，使得中日雙方在認知上，本來已經受到歷史問題影響而存在著差距，再配合諸多事件的事實的佐證，使得中日之間在認知上的差距更形擴大，也因此雙方政治關係不斷的產生嫌隙，以下將分別探討冷戰後中日之間在國際及國內層面，有哪些具體的事件，使得雙方的認知差距獲得了事實佐證。

首先，從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來看，主要關注的焦點，為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持續和發展取向，使中日之間仍無法擺脫遏止和反遏止的體系框架。此外，蘇聯解體後，中日在 20 世紀 1970 -1980 年代那種共同對付蘇聯威脅的戰略需求消失，因而使得兩國之間潛在矛盾突出起來。⁹從 1995 年 2 月美國主管國際安全的國防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提出一份美國亞太安全報告，即所謂的奈伊方案(Nye Initiative)明顯的修正了老布希時代的美國亞太政策，不再將來自日本經濟上的挑戰，視為美國的主要威脅，而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大陸的軍備擴張之上，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伴隨著中國在軍事、經濟上的崛起而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之下，1996 年以來，日美先後發表與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日美防衛新指針」以及「週邊事態法」等一系列檔，重新確定並擴大了美日軍事同盟的內容、範圍以及防衛對象，標誌著美國亞太戰略完成了由防日到防華的演變，以中國為對象的日美同盟新機制也正式確立。¹⁰

小泉執政以來，日本雖然把中國的經濟發展作為可以利用的機遇，但在安全方面則視中國為威脅，採取「聯美制華」的戰略並把軍事防禦重點轉向中國，從 2004 年日本公佈新《防衛計畫大綱》、2005 年日美發表「2 + 2」聯合聲明、「西南島嶼作戰計畫」以及「防衛整備計畫」等；2006 年 1 月，日本自衛隊首次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美國舉行聯合演習等，都說明了在安全上日本將中國視為威脅

⁹ 馮昭奎，「中日關係從歷史到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9 期(2005)，頁 38。

¹⁰ 劉學政、李志東、梅仁毅，「冷戰後中美關係中日益上升的日本因素」，杜瑞清、王旭主編，*中美關係與國際格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473。

的事實。¹¹此外，在中日雙邊關係上，亦有東海爭端、釣魚台領土、台灣問題以及近來突出的能源競爭等諸多爭端問題。這些國際政治層面的問題，若是純以現實主義的角度的國家利益來分析，可以發現中日在政治關係上將出現利益衝突的困境。

在兩國國內層次方面，亦有諸多的事件影響，增加了中共對日本認知差距的事實佐證。如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歷史教科書的爭議、2001年日航風波¹²、2002年中國瀋陽領事館事件¹³、2004年以來中國國內的反日示威遊行以及日本國內的中國人犯罪率上揚等等，均引發了國內輿論對立以及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的現象。這些議題之所以在國內成爲關注的焦點，趙全勝認爲這與中共國內的權力政治結構有關，當中共政治權力有民族主義的需求時，日本軍國主義就會在這時特別突顯，而當反日運動過熱時，軍國主義問題又會被暫時放棄。¹⁴而中共之所以能運用自如，政治宣傳機器以及大眾媒體扮演的角色是一項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中日兩國在對對方國家的報導上大都存在著「偏向性」問題。¹⁵而大眾媒體之所以存在著此種偏向性，一方面也是迎合國內民族主義的廣大市場，因此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之下，中日的政治關係陷入困境是可以想見的。

由上述的探討可以發現，中日兩國的政治困境，由於國際及國內環境的種種利益衝突，因而得到了事實的佐證，自然也就更加強化了彼此在認知上的差距，雙方在認知上差距強化之後，又將增添新的衝突利益，使得雙方的政治困境相形擴大。此外，若再配合中國學界有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的主張，以及日本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的盛行，中日兩國在認知上不斷的與事實的利益衝突相結合，政治關

¹¹ 劉江永，「中日關係政冷經熱的癥結與出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4期(2006)，頁29。

¹² 2001年1月7日，日航一架班機載著214位乘客由北京飛往東京，但由於氣候因素無法如期降落，因而改在關西機場降落，而機上116名中國乘客又因簽證問題，而遭滯留機場20小時以上，因而引發中國乘客的強烈不滿。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頁156。

¹³ 2002年5月8日，幾名不名國籍者試圖闖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日本國內因而大肆指責中國無視領事館的不可侵犯權，因而引發中日之間的拙語。吳寄南、陳鴻斌，*中日關係瓶頸論*，頁162。

¹⁴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278。

¹⁵ 高井潔司，「東亞的政治摩擦與媒體構造」，(日本：島根縣立大學，東北亞合作中的日中關係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0月)，頁135。

係的冷淡可能將繼續持續。

第二節 冷戰後中共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在對日外交中的作用

冷戰後中國民族主義一項重要的特色就是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有學者將之稱為經濟民族主義，¹⁶在經濟民族主義的作用下，冷戰後中共不論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以及在外交層面都有著清晰的戰略目標設定。只是目前此種經濟發展戰略的負面因素不斷的在政治以及社會層面顯現，這也勢必對中共的對外經濟層面產生衝擊，尤其是中日之間政治關係處與冷淡之下，中共對日外交經濟層面的定位，勢必也將可能面臨調整以因應新的趨勢發展。

一、冷戰後中共經濟民族主義的發展戰略

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首先是服務于其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東亞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伴隨著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不斷發展起來。¹⁷中國經濟民族主義的思想起源於清末，西方帝國主義挾其經濟勢力侵略中國，並以商品傾瀉、資本輸出以及侵略路權礦權和租界等方式，攫取利益，商戰的觀念便在清末士大夫階層心中油然而興起。此後，清末民初這段期間，陸續產生出振興實業、抵制外貨、收回利權等觀念，中國經濟民族主義逐漸發戰成熟，民族經濟認同的對象非常鮮明，而總的目標就是追求富國強兵。¹⁸此種傳統的經濟民族主義容易傾向於閉關自守，但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傳承，仍然影響中共的經濟民族認同相當的深遠。

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建設的思想與民族經濟的認同逐漸擱置閉關自守

¹⁶ 有關中共經濟民族主義的定義與發展，參見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論文，1997 年 1 月，頁 100-125。

¹⁷ 李曄，**中日韓新四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 年)，頁 48。

¹⁸ 唐文權，**覺醒與迷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頁 153。

與自立更生的觀念，採取積極開發與對外經濟合作的技術交流，雖然方式改變但總的目標仍是期望追求富國強兵，改革開放後中共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主要體現在 1981 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當中。董立文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的角度來看，認為決議當中有三大重點：¹⁹第一，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民族主義作了方向上的調整，在以富國強兵為總目標之下，把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為主要訴求的反帝國主義形式的民族主義，轉換成以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工作重點的經濟建設形式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族主義與經濟建設作為主要訴求，將易於形成一種科技民族主義取向，強調生產、管理與效率的追求。第三，則是在於文化中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將更加體現，因而在 1980 年代強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神污染。

民族主義與經濟現代化的目標部署，也反映在中共 1987 年提出的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所謂三步走是指：第一步，從 1981 年到 1990 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 20 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的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²⁰按照此戰略部署，中國在 1987 年提前三年實現第一步翻一番，1995 年提前五年實現翻兩番的目標。而目前關於第三步的戰略部署，中共也在十六大當中，完整的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至於中共民族主義在對外經濟戰略中的發展顯示出，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軌跡當中，民族主義也面臨了轉型的壓力，過去的民族主義往往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排他性安排，因而衍生出了許多的對立與爭議，而當今民族主義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則將是透過既衝突又合作的模式進行調整，以因應新的發展趨勢。²¹

¹⁹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135-136。

²⁰ 曾喜炤，「經濟發展」，施哲雄主編，**發現當代中國**（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 年 10 月），頁 227。

²¹ 如日本一橋大學教授三田敦史(Atsushi Yamada)在 1999 年提出的新科技民族主義的概念，即強調雖然國家利益仍必然優於全球利益，但是在政策的選項上，各國所採行的科技政策，不再是由政府主導產業政策，而是近年來普遍出現的，由民間主導，政府部門提供協助的產業發

因此，中共一方面提高農工業產值，加強國際商業與金融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則承認國際體制的規範，加入國際賽局當中以進行競爭。而爲了達成富國強兵的總體目標，過去 1950 年代閉關自守的自立更生手段，顯然已經不符合現今的趨勢，當前中共經濟民族主義在擴大開放與深化改革的政策方針之下，超英趕美似乎也已經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二、冷戰後中共經濟民族主義在社會層面的作用

探討冷戰後中國的社會情勢，現代化一詞可以是個起點，現代化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在國家宣傳的意識形態上佔據核心的位置，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大肆宣傳之下，亦深入民心。例如，1982 年，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使得現代化成了國家發展的具體目標，亦成爲民眾心之所向的群體認同。²²

不過，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社會結構卻也產生了快速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經濟策略，導致社會結構上不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地區的發展也面臨失衡的危機。1997 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中國收入分配報告就已經指出，中國大陸在經濟增長雖然有重大的成就，但是增長的收益分配不均，能利用市場利益者往往享受了經濟增長的成果，政府的政策(如限制人口流動、教育資源分配不公)也讓社會不平等日益深化，該報告便認爲，這種高程度的不平等性，已經降低了經濟成長率，弱化了消除貧困的能力，也導致社會的緊張與騷動。²³此外，中共官方與國際機構對於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的增長率的預估爲 3%--8%，不過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並不是經濟增長速度快與慢、或是 8%與 3%之間的區別，而是成功與失敗、或繁榮與崩潰之區別，即如果中國不能維持 7%到 8%左右的有效經濟增長率，將無法應付經濟轉型的挑戰，可能導致社會與政

展模式。轉引自彭慧鸞，「從中美技術標轉戰看中國崛起:既衝突又合作的策略選擇?」，蔡璋主編，*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05 年 7 月), 頁 169。

²² 陳志柔，「中共 16 大後社會情勢分析」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 時報文化, 2004 年 1 月), 頁 79。

²³ World Bank, *Sharing Rising Incomes: Disparities in China*(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治的動盪，導致外資怯步、金融危機，形成惡性循環，導致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同時陷入危機當中。²⁴

社會結構失衡的問題，最引人關心的就是它產生的政治後果，何時會危及政權的穩定與合法性，沒有人能準確預測，因為這個問題一方面取決於經濟、政治的環境條件，二方面受制於行動者(中共中央領導、地方政府、經濟精英、民間自主力量)因應政經環境條件的策略選擇，第三方面的影響因素則可能來自歷史過程中的偶發且不可預期的因素，如天災人禍、國際情勢的劇烈變動等。²⁵總之，其間的轉化仍需要諸多的因素條件配合。而當前最受到關切的議題就是社會不平等的擴大與社會抗議事件增多的同步進行，中國群眾的抗議事件從 1993 年的 8700 件，增加到 2005 年的 8 萬 7000 件。²⁶黨中央與政府領導人對於這些社會動亂，當然也無法視而不見，因而也坦白的承認必須解決經濟操作引發的不安定與不健康因素，於是在 2005 年出爐的第 11 個五年計畫綱要當中，強調全方位、協調與可持續發展之必要，以及改進社會福利。²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層面的危機一向都被認為是考驗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而冷戰後中共雖然透過民族主義與經濟現代化的強調，強化了其政治合法性的地位，但日後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就是人民認同的是中國還是共產黨在社會上形成的矛盾。目前在許多抗議事件上，政府似乎都採取較寬容與圓熟的策略，承認溫和的不滿與抗議，是中國當前發展狀態所不可避免的社會後果，但在多數頑抗到底的棘手案例上，地方政府仍採取嚇阻與鎮壓的態度。²⁸不論是民族主義或是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目前在中國社會上都產生許多負面的發展趨勢，至於是否會衝擊到中共的政權以及影響中共的對外政策，想必這將是當前胡溫體制

²⁴ 童振源，「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轉型與挑戰」，頁 64。

²⁵ 陳志柔，「中共 16 大後社會情勢分析」，頁 88。

²⁶ 群眾事件包括罷工、示威、靜坐、阻礙交通及佔領大樓。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頁 50。

²⁷ 「中國共產黨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社**(2005 年 10 月 11 日)。

²⁸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頁 53。

特別強調建構「和諧社會」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全方位戰略的因素之一。

三、冷戰後中共經濟民族主義轉型下的對日外交分析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經濟關係可謂是中日兩國間最為長久且實際的聯繫，冷戰後在經濟利益的導引下，兩國的資金合作與經貿關係依舊十分緊密，中共為持續深化改革，持續將經濟發展視為對外關係的重要項目，而日本為早日擺脫 1992 年泡沫經濟瓦解所帶來的經濟難題，也更加重視中國大陸市場與投資商機。²⁹從 1990 年代末以來中日關係逐漸加劇的政冷經熱的結構狀態，雖然經濟上雙方仍保持密切的交流與合作，但是在雙方政治上冷淡的影響之下，有學者認為當代國際關係發展的基本趨向就是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的融合與互動日趨強烈，中日政治關係的持續冷淡甚至趨於惡化，將會嚴重妨礙中日經濟關係的正常發展。尤其是近來中日之間在歷史問題(主要是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領土問題(主要是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等方面的對立和衝突愈演愈烈，極大地干擾了經濟關係的發展和穩定，可能從而導致中日關係開始陷入「政經雙冷」的困境之中。³⁰

中日之間是否會陷入「政經雙冷」的困境，根據上節的探討，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主要的目標就是追求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但其所衍伸的問題就是能否保持社會與政治上的穩定。而當經濟高度發展的同時，是否會因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導致過去強國情結與受害者心態再度甦醒，而影響對外經濟層面，將值得觀察。從當前中日經濟關係的現狀來看，中日之間經濟合作是雙方的共同需求，但在隨著政治冷淡與雙方民族主義的對立，在經濟層面也產生了不小的衝擊，許多的競爭層面也更加突顯出來。

從 2002 年以來中日政治冷淡的特色更加突出後，對於雙方的經貿關係也產生些許的影響，這反映在中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當中比重逐年在下降，中日貿

²⁹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頁 214。

³⁰ 江瑞平，「中日經濟關係的困境與出路」，**日本學刊**，第 1 期(2006)，頁 64。

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已從 1985 年最高時的 30.4%降至 2004 年的 14.5%，其主要的因素除了由於中日政治關係趨於冷淡，一些大型的合作項目難以落實，以及 2004 年日本結束了從中國進口時有的歷史之外，就是日本對華貿易的保護主義開始抬頭加之以政治因素的干擾，對華將強反傾銷和市場准入限制等因素。³¹到了 2005 前十個月的統計，日中貿易成長 10%，而中共與歐盟、美國都分別成長了 20%強，日本在中共對外經濟交往中所佔的比重已呈現下滑，日本財經界也開始憂慮日、中高層溝通管道的阻塞將會增加兩國之間的誤解與矛盾，而政治冷淡長期持續將損害兩國的經濟關係。³²

經濟發展不只會增強國力，可能也會促使中共更加積極的爭奪能源控制權，以利未來發展所需。³³隨著中共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戰略結合，在追求富國強兵的總體目標之下，反映在中日關係的利益競爭層面，就是中日雙方對於能源的競爭。中共能源外交的戰略部署，在東海這一塊領域明顯的與日本產生衝突。中日在東海上的能源爭端，雙方僵局表面上是為了爭奪能源，核心更涉及到了領土與主權問題，雙方都極力的捍衛有一些戰略價值的領土主權。³⁴從 1990 年之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對於能源需求也日以據增，石油與天然氣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原油產量年平均增長 1.6%，而原油消費的年平均增長卻在 4.5%以上，巨大的能源供給與需求的落差使得中共從國外輸入能源的比例日益升高，其對外依存度也進一步擴大。根據中共商務部統計，2003 年中國原油消費得 2.5 億噸，其中從國外進口達 9112 萬噸，首度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³⁵目前中國已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不可能像 20 年前那樣對日本提供大量石油資源，中日能源的競爭也呈現明顯的上升。

³¹ 劉江永，「東亞格局與中日關係」，頁 66。

³² 何思慎，「日中關係：風波或坦途」，**展望與探索**，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11。

³³ Michael Leifer,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Security Policy: The South China Sea Connection," *Survival*, Vol.22, No. 2(Summer 1995), pp.44-45.

³⁴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頁 178。

³⁵ 唐衛斌，「中國石油安全與能源外交」，**外交學院報**(上海)，第 6 期(2004)，頁 73。

雖然近來中日在經濟層面存在著些許的磨差與競爭的突顯，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不容小覷。尤其日本是資源窮國，又是貿易大國與對外投資大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亞洲鄰國，在經濟發展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離開世界市場便無法生存發展。³⁶現今對日民族主義高漲之下出現的「抵制日貨」風潮，是 20 世紀前半葉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現象，雖然其中有愛國民眾抗議日本侵略中國的政治原因，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當時經濟基礎方面的原因，即當時的國際經濟關係主要地是以國際貿易為核心展開的，在激烈的國際貿易競爭中，中國弱小的民族資本難以抵擋日本壟斷資本的產品競爭，而且通過「抵制日貨」也的確可以多少起到保護民族工業發展的作用，但是當現代國際經濟關係的主體轉變為跨國公司以後，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許多「日貨」就是在中國本土僱傭中國勞動者生產的，抵制日貨的結果，必然是造成大量的中國勞動者失業。³⁷當今中國在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需要的是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因而經濟層面的民族主義也勢必面臨轉型與調整，民族主義對經濟層面的影響力也將與過去展現出不同的型態。

當前中共為積極的的佈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在外交策略上亦積極的展開經濟外交的戰略部署，經濟外交越來越成為界定中國新外交的標誌之一。³⁸關惠謙認為中國目前已經從被動的「以經濟促外交」，轉到有意識的主動的「以外交促經濟」，這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從 2004 年中國「以外交促經濟」全面出擊的各種活動便可以看出。³⁹因此，中日儘管在經濟上存在著競爭的認知，但是從現狀來看，中共經濟外交的戰略發展似乎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根據自由主義者的經濟互賴(interdependence)的角度來分析，未來中日或許可

³⁶ 王良能，**中共崛起的國際戰略環境**，頁 214。

³⁷ 李曉，「經濟主義時代中日關係」，**國際經濟評論**(北京)，第 3-4 期(2006)，頁 8。

³⁸ 王義桅，「中國進入以外交促經濟時代，面對世界更加自信」，**第一財經日報網路版**。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501040904.htm>>

³⁹ 關惠謙，**德學者：經濟外交改變中國整體外交版圖**，**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 月 28 日)。

以藉著經濟合作所來的利益，而逐漸化解彼此政治上的對立與矛盾。但是中國內部的情況深刻的影響著中國對外政策，也決定了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世界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中國，⁴⁰中國當前社會不平等結構所造成的不滿情緒相當高昂，社會上反日情緒亦是相當高昂，若是這兩種力量相結合，甚至危及中共政權穩定時，勢必也可能造成中日關係將更加緊繃。

第三節 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外交中的軍事層面的意涵

最為突顯冷戰後中共民族主義所顯現的侵略性與擴張性，就是民族主義在中共軍事層面的影響力，這也是主張中國威脅論所憂慮的議題，不論是日本或是世界都關注著中共軍力的發展。至於民族主義高漲到最後，是否一定需要擴張與侵略，這就要端視中國民族主義是否能展現出中國的特色，而不與西方走向同樣的歷史道路。

一、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共軍事層面的作用

冷戰後中共領導階層企圖透過經濟改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來強化其政權的鞏固，尤其是天安門鎮壓事件，使得中共的決策層因而更加的倚重在政府的政策上仍握有重要影響力的人民解放軍的支持。⁴¹而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向是最反對西方價值觀，最為主張民族主義價值，最恨西方在歷史上曾對他們的虐待，及在爭取海洋主權議題上最具侵略性的一群人，因而民族主義反映在解放軍的思想觀念中，將特別強調領土主權的維護以及中共在海權的爭霸地位。⁴²未來中共若要變得更強以及更具侵略性，共軍將是投射武力的主要推動力與執行單位，而從國內

⁴⁰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著，樂為良、黃裕美譯，**重估中國崛起**，頁50。

⁴¹ Jasper Becker, *The Chinese Peopl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2002), p.237.

⁴² You Ji,"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a key interest group in Chinese party politics," in Brodsgaard & Zheng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59-76.

政策來說，共軍一向是扮演著維護領土主權最力的民族主義支持者，也是承擔這項重責大任的機構，因而中共透過民族主義強化其政權地位的同時，勢必也將面臨外界對其軍事力量崛起的不安。

1991 年爆發的波灣戰爭，美國挾其優異的高科技部隊，在短時間之內以及少的傷亡擊垮伊拉克駐軍，此事帶給中共領導人極大的衝擊，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認為，海灣戰爭使我們進一步看到科學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運用，我們不是唯武器論者，相信最終決定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但是先進的武器畢竟是重要的，科學技術是不能忽略的。⁴³因而重視科技的思想首先在中共國防思想上突顯出來，中共人民解放軍在九零年代的建軍方針，是為在積極防衛戰略指導下的高技術的局部戰爭準備，在國防現代化當中強調科技的現代化。1990 年代後期，世界局部戰爭的高技術含量不斷加大，特別是科索沃戰爭之後，資訊化戰爭嶄露頭角，世界軍事強國開始了以資訊化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人民解放軍也開始以國家戰略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國家綜合國力為基礎，堅持科技強軍戰略，圍繞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的目標。⁴⁴

江澤民在 1996 年正式將科教興國的戰略與愛國主義結合在一起，並聲稱二十一世紀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將是全面振興的世紀，祖國在期待，人民在呼喚。黨中央號召全國各條戰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教興國的光榮旗幟下團結起來。⁴⁵軍事的科技化一方面可以反映整個經濟體系的實力，從國家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軍火工業的發展與進步，也直接代表著民族國家的權力與光榮，科技因而跟領土一般被視為是民族的基本利益之一，必須受到保護。⁴⁶

冷戰後民族主義反映在軍事層面，為強調軍事科技與現代化的趨向，軍事預算逐年升高的結果，也使得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更有發揮的空間。美國四年一度的

⁴³ 江澤民，「高度重視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經濟日報*(1991 年 8 月 8 日)，版一。

⁴⁴ 張佔軍，「充滿生機的人民解放軍第 3 次現代化」，*時事中國*，2006 年 8 月，頁 33。

⁴⁵ 江澤民，「科教興國」，*人民日報*(1995 年 5 月 27 日)，版一。

⁴⁶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140。

防務報告在 2006 年就指出，自 1996 年開始，除 2003 年外，中國每年的國防開支以超過 10% 的比例增長。尤其在戰略武器方面，中國試圖加強投送力量的能力，中國可能會持續進行各種大規模的軍事投資，包括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尤其是電子戰、網路戰和太空戰能力，以及開發先進的作戰武器平臺，如潛艇、戰略核武器、戰術無人機等。為此，報告認為：⁴⁷「中國軍力擴張的速度和範圍已使區域軍力面臨失衡的危險。」接著報告指責中國對安全事務採取了遮掩的態度，使外界對中國的動機和決策程式了解甚少，報告中還指出美國積極鼓勵中國採取行動，澄清軍事發展計劃和意圖，儘管中共軍事發展的意圖不是相當的明確，但在報告中還是給了一個解釋：⁴⁸「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從 20 世紀 90 年中後期以來開始加速進行，這是為了應對臺灣問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而預作軍事上的準備。」

未來如果中共經濟持續的增長，中共將可能成爲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其所發展出的軍事力量也將足以支撐更具侵略性的政策，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便表示:隨著中國近年來經濟力量的成長，民族主義也大爲高漲，他預測國力的增加可能會讓中共產生防衛心與高度自信心。⁴⁹民族主義強調富國強兵的目標，雖然可以是一種健康的力量，促進軍事科技的發展，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但是若是只把物質追求與科技進步作爲國家富強的唯一指標，而不借鑒於世界文明先進國家的文化成就，這種取向的民族主義將容易走向軍國主義的道路。⁵⁰尤其其中共人民解放軍是民族主義最爲強烈的集團，強調擴張侵略的民族主義情緒若是放大威脅的認知，並且與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相結合，演變成似乎非要打一場國際戰爭，中國百年的怨氣才得以抒發，這似乎並非中華民族之福。

⁴⁷ 美防務報告：中國最具有與美國進行軍事競爭潛力，**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2/08/content_4151409.htm>

⁴⁸ 「美防務報告：中國最具有與美國進行軍事競爭潛力」，**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2/08/content_4151409.htm>

⁴⁹ David Shambaugh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圍堵或交往?評估北京的回應」，Michael Brown 主編，**中共崛起**，頁 319。

⁵⁰ 董立文，「論 90 年代中共民族主義」，頁 146。

二、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中共對日軍事安全層面的影響

中共早在 1993 年舉辦有關未來威脅的研討會當中，就有 60% 的與會人員認為，在 2020 年時會對中共安全構成最嚴重的威脅非日本莫屬。⁵¹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存在於中日民族主義建構的歷史認知問題，反映在軍事安全層面，將可能的是放大彼此的威脅認知，形成軍事安全上的對立與困境。布贊(Barry Buzan)便曾指出歷史性敵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與反覆的戰爭經常放大了當前的威脅認知。⁵²而歷史經驗所放大的認知差距，蔡增家就認為中日之間在認知上的差距，日本認為其追求正常國家只是恢復軍事上的自主權，因此是符合現狀的，而中共卻認為是要恢復軍國主義，意圖要改變現狀；另外中共認為中國大陸經濟崛起是一項和平崛起的政策，是符合國際現狀的，反觀日本則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是中國威脅論的興起，是意圖改變國際現狀的，而日本因為國內經濟的持續衰退而逐漸強化對中共崛起的不安，中國大陸也以過去歷史的記憶來強化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⁵³中日在安全認知上的差距，似乎也反映了進攻性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的觀點，他認為這是無法避免衝突的悲劇歷史循環，因為大國是否能成功的實踐地區霸權，端視於是否能突破水域的遏阻力量(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⁵⁴

當中日雙方均放大了彼此在安全上的威脅認知之後，中日之間的安全關係上也就非常容易形成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在新現實主義者的認知中，認為其是國際關係的常態，它普遍存在於各類型的國家當中，主要原因在於長期以來國際關係一直處與無政府的狀態。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N. Waltz)就指出：在此狀態中，各國都無法摸透彼此的意圖，為了安全，各國便將自己武裝起來，而在這樣做時，惡性循環便形成了。各國出於安全考慮將自己武裝起來

⁵¹ William Tow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安全整合*，頁 47。

⁵² Barry Buzan,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59-60.

⁵³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頁 64。

⁵⁴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的分析」，頁 167。

後，更感不安全，需要購買更多的武器，因為保護任何一國安全的手段是對其他國家的威脅，而後者又轉而武裝起來作為對前者的反應。⁵⁵ 布贊(Barry Buzan)也指出，當國家為自己尋求權力與安全時，很容易威脅到其他國家對權力與安全的追求，安全困境因此產生。而從中國內部軍政情況來看，人民解放軍是民族主義堅定的支持力量，而軍方為了爭取大量的國家資源，想必也將會提出各種威脅的想定。⁵⁶

而中共對日本安全上威脅感的擴大，也使得中共軍方的分析人員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與其干預朝鮮與台灣情勢的可能、強化與美國關係，以及擴大區域安全角色等持高度的懷疑。⁵⁷反日情結在共軍的各個階層都可以明顯的感受到，而對日本的不信任也深深的影響著各個世代，其中四十或五十多歲共軍軍官更是對日本充滿敵意。⁵⁸中日民族主義對立反映在安全層面上，歷史性的敵意與現實上的追求權力，形成了中日軍事安全上難以化解的困境。

雖然中日之間在安全層面，亦存在著諸多的矛盾與困境，但從中共的認知來看，目前中國對於自身的認知仍屬於發展崛起中的階段，在許多議題上若是採取強硬的手段，將可能引起國內或周遭環境的不穩定，因而當前中共的外交戰略在軍事安全上仍是期望能尋求一個穩定的環境以利和平發展，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早在 1997 年江澤民便首次提出新安全觀的立場。⁵⁹到了 2002 年中共正式在東協外長會議中提出，並在十六中正式納入政治報告之中，新安全觀在中共外交戰略的重要性逐漸的增加。

⁵⁵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s an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3-5.

⁵⁶ William Tow 著，**亞太戰略關係—尋求安全整合**，頁 43。

⁵⁷ Thomas J. Christensen 著，國防部始政編譯室譯，「中共、美日聯盟及東亞的安全困境」，Michael Brown 主編，**中共崛起**，頁 210。

⁵⁸ Thomas J. Christensen 著，國防部始政編譯室譯，「中共、美日聯盟及東亞的安全困境」，Michael Brown 主編，**中共崛起**，頁 208。

⁵⁹ 新安全觀是中俄於 1997 年 4 月 23 日結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時所提出。根據中共政府前官員陳有為認為此夥伴關係，目的在加強雙方在世界事務的影響力，以及牽制美國在國際舞台的分量。而中俄聯合聲明所謂的任何國家都不應謀求霸權，反對冷戰思維與擴大軍事集團，絕不是指日本、德國或是其他任何國家，而是美國。因為唯有美國，以其冷戰時期所處的獨一無二的國際地位，才有可能推行強權政治，對中俄形成威脅。引自丁永康，「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構國際新秩序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6 期(1999 年 6 月)，頁 57-58。

新安全觀觀點可以說是承襲了過去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精神，並且結合後冷戰的國際環境，所發展出的對外關係理論。中共官方看待新安全觀，比較著重於國家間有別於冷戰時期的交往型態，也就是所謂的新型國家關係，在歷次中俄聯合聲明當中，中共就一再聲明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突顯新型國家關係與過去不同，鼓勵各國應透過對話與合作增進互相的信任與了解，謀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家間的爭端，此外 90 代中後期，中共領導人也明確提出國際社會應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而此不僅表現在軍事外交層面，同時亦包含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意涵。⁶⁰中共提倡新安全觀的戰略意涵，除了可發展對美國的多極制衡力量，聯手其他國家共同反霸，亦能在反霸的過程中藉由經濟合作增進國與國之間的互信互賴，以創造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安全環境，進而謀取最大的國家利益，累積爭霸的籌碼，所以新安全觀在戰略意涵上也具有爭霸與反霸的雙重意涵。在反霸方面，中共將堅持歷史使命，對美國霸權行為繼續進行鬥爭與反制；在爭霸方面，將視綜合國力的提升程度，尋求成為地區性霸權，甚至全球霸權。⁶¹

民族主義在中日軍事安全層面的影響，雖然易於使雙方放大認知上的差距，形成安全上的困境，但就中共目前自身的認知及定位來說，互信、互信、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似乎為其目前和平發展戰略的主要依據。此外，雖然中國民族主義對領土完整以及國家主權地位維護是具有相當濃烈的色彩，但是是否因此中國民族主義就具有擴張性與侵略性。事實上，改革開放以經濟追求為中心的基本國策，連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限定了中國追求的安全程度。哈丁(Harry Harding)便曾說，鄧小平的改革計畫中一個核心的因素，在於恢復中央對人民解放軍的控制，並降低軍隊在民眾性事務中的地位。⁶²因此，在沒有大規模外敵入

⁶⁰ 朱蓓蕾，「全球化與中共新安全觀:轉變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6 期(2003 年 11、12 月)，頁 90-92。

⁶¹ 引自王承業，「中共建構新安全觀的戰略研究取向」，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94-102。

⁶² Harry Harding, "On the Four Great Relationships: The Prospects for China," *Survival*, No.36 (1994), p.28.

侵的情況下，很難想像中國應當會爲了尋求高度安全甚或絕對安全而嚴重分散資源投向，從而損害中國富強的前景。

從現在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來看，中國正在繼續提高與國際社會的認同，深入內化合作型戰略文化，對經濟安全利益和其他非傳統安全利益也更加重視。⁶³因此，在對日安全關係上追求雙贏的互動模式影響力將逐漸增加，只是中日的未來意圖、中日民族主義對立的持續發展以及是否能有完善的機制建立以增加彼此的信任，將可能是未來影響中日安全關係是否能穩定發展的重要變數。而中共如何在其對日關係中取得利益平衡，另一方面又要指責日本對其海外防衛能力進行現代化的行爲，這將是成爲未來 10 年及其以後中共外交人員將面對的最大政策挑戰。



⁶³ 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王緝思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台北: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07。